

精神之旅

思想之旅书系

祝东力 著

思想之旅书系

精神之旅

B63-253
1

出版社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思想之旅书系·

精神
之旅

——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与知识分子

祝东力 著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精神之旅



祝东力 著

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精神之旅：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与知识分子/祝东力著。
- 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1998. 4
(思想之旅书系)
ISBN 7-5043-3153-8

I . 精… II . 祝… III . ①美学 - 研究 - 中国 ②知识
分子 - 研究 - 中国 IV . 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0404 号

精神之旅——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与知识分子

| | |
|---------|------------------------------|
| 作 者： | 祝东力 |
| 责任编辑： | 王 平 |
| 装帧设计： | 钟 嵘 |
| 责任校对： | 谭 霞 |
| 出版发行： |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
| 社 址： |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
|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
| 印 刷： | 涿州先锋印刷厂 |
|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
| 字 数： | 146(千)字 |
| 印 张： | 7.75 |
| 版 次： |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
| 印 数： | 6050 册 |
| 书 号： | ISBN 7-5043-3153-8/B·80 |
| 定 价： | 13.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前　　言

从 1979 年起，国内的报刊杂志开始大量刊发有关美学的文章，数量逐年递增：1979 年是 60 余篇，1980 年增至 120 余篇，1981 年仅上半年已达约 90 篇。据不完全统计，到 1985 年，各种美学论文已累计近千余篇，著作数十种，形成了历时数年、引人瞩目的“美学热”。

新时期初期的这场“美学热”（1979～1985 年）是当代知识界、文艺界乃至一般读书界的一个重要事件。关于“美学热”，以往的评述文字往往局限于单纯的学术史立场，遗漏了这一思潮与其发动者和参与者——知识分子——之间的密切关联。本书认为，“美学热”决非仅仅是一场单纯的“学术繁荣”，事实上，它是“文革”之后，知识分子的一段内心历程的表征。在当时，美学学科远远超出了自身，而负载着一系列深刻的社会意识形态含义。可以说，正是这些含义推动、支撑着“美学热”，并在稍

后又决定了它的沉寂。因此在新时期初叶，美学成为一种“能指”，成为一种知识分子的话语。

在中国当代史上，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剧变，包含双重意义：一方面，它使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左翼传统抵达巅峰，另一方面又使该传统跌入深渊，越出自身的合理范围，遭遇重大挫折，并由此催生出另一种自由主义的传统。“文革”结束后，伤痕—反思文学感叹和痛斥了先前的反人性历史，使具有自由主义价值倾向的文学知识分子步入历史的前台。与此同时，持守同样立场的人道主义哲学则指向两个方向：一方面是对现实和历史中的异化现象的揭露和批判，从而直接与伤痕—反思文学声息相通；另一方面则是对普遍人性的论证和展望。人道主义哲学的这一方面，在逻辑上和事实上导致了哲学的分支学科——美学的蓬勃兴起。在“文革”时代的社会政治理想破灭之后，作为一种替代物，美学以“自然的人化”为核心概念层层展开，为“人性复归”的历史远景提供了一个切近的经验的范例，从而代表了知识分子在新时期初叶的一种终极理想。

1985年以后，一方面，以小说为代表的纯文学日益转向形式、语言、技巧的实验探索，迅速专业化并退出公众的视野。另一方面，报告文学则异军突起，继承并强化了新时期初期小说指涉现实的功能。新潮小说与报告文学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打破了先前的平衡。同时，在文艺理论领域，性格组合论强调了人性的“恶”的方面，消解

了前一阶段文学和美学的人道主义基础。主体性理论突出了知识分子的主体自我意识和批判精神，使知识阶层稳步地转型为新的“领导阶级”（知识精英）。新方法论思潮表露了知识分子变革现状的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遍及知识界的文化大讨论则通过抨击中国传统文化，为现实的政治批判和西方社会思想甚至制度的引入，准备了舆论基础。到 80 年代后期，随着知识分子的日益政治化和激进化，审美的乌托邦被逐渐搁置，一种以西方模式为社会发展目标的思潮充溢泛滥。至此，美学终于完成了新时期初叶为新的人性理想提供具体范例——这一意识形态使命。美学回归于专业学科，并因此趋于沉寂。在这一过程中，美学领域的侧重点经历了从美的哲学（80 年代初期）到方法论（中期），再到美学史（后期）的三个阶段。

到 90 年代初，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成席卷之势，知识分子退守边缘。他们脱离原先的社会角色，转向平淡的散文和考据式的纯学术研究。在大众审美文化的浪潮下，经典的审美心理被严重消解，“审美”泛化为一种感性的文化：一种感性的生活方式、娱乐方式、消费方式。传统美学失去了原先的社会和心理基础，成为一种过时的僵硬的理论范式。美学界开始倡导话语转型，纯美学被倾向于放弃，一种切近当代文化现实的、片断的、经验性的审美文化批评悄然兴起。同时，新的转机也在酝酿之中。可以预期，在世纪之交，中国古典美学（作为所谓“亚洲价值”的思想史资源之一）将得到挖掘和阐扬。

根据上述情况，本书将以新时期的美学历史（从“美学热”到90年代审美文化批评）为对象，在兼顾其学术得失的同时，重点探究导致“美学热”的兴盛与衰落的社会意识形态含义，并始终将这种研究，放置到当代知识分子文艺及思想的语境中，放置到知识分子境况的变迁之中来进行。

因此，本书章节将安排如下：

引论将以书面文化的涵义为基础，对以后各章反复涉及的三个概念——知识分子、美感和意识形态，做一简要的概括说明，阐明三者的内在联系，以便为以下各章的历史性讨论提供一个理论前提。第1、2两章分别叙述新时期初叶的文学和哲学语境。第3章是全书核心，在概述“美学热”鼎盛时期的现象后，重点探究作为其基础的意识形态含义及其相应的方法论特征。第4章简评80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的文艺和思想状况。第5章议述美学转入沉寂的情况，概括新时期十年美学发展的三阶段。第6章在勾勒了90年代前叶的社会文化背景之后，评议美学学科的最新发展，并对未来的可能趋向做一推测。结束语总括全书，阐明人、知识分子和美学的历史过渡性质。

目 录

前言

引论 理论前提

- 一、书面文化的涵义 / 1
- 二、知识分子的两种可能 / 7
- 三、超越的美感 / 13
- 四、意识形态与解释学 / 19

第1章 文学知识分子

- 一、“地下”写作 / 24
- 二、普遍的体裁 / 36
- 三、书面文化的分裂 / 42

第2章 新时期的人性

- 一、阶级斗争学说 / 48
- 二、革命与世俗生活 / 50

三、人道主义哲学 / 52

四、两个主题 / 60

第3章 美学热

一、aesthetica / 71

二、学术准备 / 75

三、鼎盛的局面 / 81

四、阐释 / 86

五、两种倾向 / 91

六、方法问题 / 98

第4章 失衡的语境

一、小说的分裂 / 106

二、三种理论，一个人物 / 113

三、文化大讨论 / 124

四、一个时代的终结 / 129

第5章 衰落

一、一个征兆 / 140

二、从意识形态到科学 / 147

三、美学史 / 151

第6章 散文时代

- 一、边缘化 / 159
- 二、散文、人文精神与国学 / 166
- 三、人民形象 / 175
- 四、审美文化 / 179
- 五、美学话语转型 / 184
- 六、一种推测 / 189

结束语 过渡时期的现象：
人、知识分子与美学

附录 康德与反美学史

后记

引 论 | 理论前提

一、书面文化的涵义

70年代末以后的新时期十年，堪称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知识分子时代。在这十年，知识分子阶层曾发挥了空前绝后的影响，从学术文化到社会政治舞台，搬演出一幕幕历史活剧。这期间，有开创、有实绩，也有错误、迷乱和重重歧途。大凡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常常发生在一个喧哗的知识分子时代终结之后。此时，理性代替激情，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渐趋完整，它们的涵义也日渐澄清。因此，以下尝试提出的尽管是一种一般性的知识分子理论，但这种理论的每一个结论，都无不同时也是历史经验的凝缩与提炼。

在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理论曾采取两种彼此区别的方

法，即现象学方法和知识社会学方法。现象学方法是一种“内在的”的方法，它以个体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为出发点，着眼于他们特定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例如让—保罗·萨特的著名界定：“知识分子就是那种关心自身之外事务的人。”^[1]知识社会学采用一种“外在的”方法，关注点是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特定位置。例如卡尔·曼海姆认为，在社会各阶层中，唯有知识分子“不隶属于任何阶级”，因此，唯有他们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观点立场，努力追求一种非偏狭的、整体的视野。曼海姆称之为“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能够“在漆黑长夜里充当守更人（watch-men）的角色”。^[2]

尽管采取不同的方法，但萨特和曼海姆的理论都确立了一种崇高的、理想化了的知识分子概念。这种经典的知识分子概念在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环境中，理所当然地被指认为“神话”，并受到摒弃。例如，在法国当代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及其在中国的附和者们那里，便是如此。然而，实际上，任何“神话”作为人类特殊的观念形态和叙述形式，都有它们特定的真实依据，都有它们据以产生的特定的现实基础。因此，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便不是指认“神话”并加以摒弃，而是澄清和阐明那些支撑着“神话”的真实依据，是区分“神话”的虚幻部分与真实部分。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神话”诞生的机制，理性地对待“神话”，使“神话”还原为真实的认知，并正当地、合理地发挥作用。

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探讨，可暂且以马克斯·韦伯的界定为依据。在一本生前未公开出版的笔记中，韦伯写道：“我们以‘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表示这样一群人，他们由于自身的特性而掌握着某些据认为是‘文化价值’的成果；因而，他们便获取了对某一‘文化共同体’的领导权。”^[3]实际上，韦伯的界定勾勒了知识分子的两种职能，即掌握文化，以及领导某一文化群体。

我们可以这样说，知识分子最低限度的职能是掌握、传承和创制文化，更准确地说，是掌握、传承和创制“书面文化”，即：通过写作而固定下来的各种“文本”，以及与它们血肉相联的特定的“经验—行为方式”。“文本”指一定长度的文字乃至一般的符号作品，我们可以举出诸如圣经、黑格尔的《小逻辑》、荷尔德林的诗、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等等；所谓特定的“经验—行为方式”，可以举出写作、抽象思维和美感经验等等。其中，抽象思维和美感经验通过写作活动而凝定为各种文本，例如上述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文本”是书面文化中唯一稳定和客观化的部分；与之相反，书面文化中的“经验—行为”则是主观的和瞬息变化的，难以被人们直接把握和剖析。因此，“文本”构成了书面文化的内核和骨骼，成为理解书面文化的基础。

掌握书面文化是知识分子的最低职能，也是他们的最基本的职能——由此派生出知识分子的其他职能。因此，书面文化，尤其是“文本”，掩藏着知识分子本质的秘密，

成为理解他们的本质的一把钥匙。

与书面文化形成对峙的是普通的日常口语。

典型的日常口语的特点是：它们的意义直接依赖于当下的特定语境（具体环境、交谈者双方的共识，等等）。当日常交谈发生的时候，在场的不仅有交谈者，而且，当下语境也积极地直接参与口语意义的构成。口语的意义是由实际说出的部分（言语）和未说出但却被暗含、参照和指涉的部分（语境）共同构成的。

俄苏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认为，日常口语经常用极其简短的语句表达十分丰富的内涵。他举了下面的例子：有两个人坐在房间中默然无语，后来一个人说：“这样！”而另一个没有回声。的确，无论事后怎样研究并确定这个简短语句的语音、语法和语义特征，我们仍然无法领会它所传达的全部意义。巴赫金写道：“那么，我们缺少的是什么？我们缺少‘词句之外的语境’，这个语境使‘这样’对于听者具有特定的意义。”^[4]他接着描述说，令人厌倦的漫长冬天就要过去，春天将临。然而，窗外又是茫茫大雪，两人面对冬末的落雪深感懊丧——

这种“都看到”（窗外的雪片），“都知道”（季节）以及“共同的评价”（厌倦冬天，盼望春天）正是言谈所直接依赖的，所有这些都包容在言谈实际的、活生生的含义中，是言谈的支柱。但所有这些都没有获得词句的说明或表达。雪片在窗外，时令在日

历上，评价在说话人的心里，不过，这些仍暗含在“这样”一词当中。^[5]

我们知道，语言符号由能指（物质媒介）和所指（观念性的含义）组成。语言的含义具有明确的指涉功能。例如，“雪片”这两个音节或文字（物质媒介）在一定的语言体系（汉语）内有其特定的含义，这种含义指涉着一种实际存在物，即真实世界中的雪片。语言的指涉功能使语言与周围世界发生千丝万缕的、生动的联系，使语言成为“及物的”。

日常口语的特点在于，它的被指涉物经常是在场的，构成当下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口语经常与交谈者们的手势、姿态、行为交织在一起，它的含义与它的被指涉物常常具有直接的、活生生的联系。例如，在“关上门！”或“请把盐递过来！”这样典型的日常口语中，语言的含义与眼前的被指涉物融为一体，依附在、呈现在被指涉物身上。

可以说，口语与当下语境编织在一起，一旦将交谈抽离出语境，它的意义就难以索解。因此，尽管口头语言是具体的、生动活泼的，但它们仍然包含着不可摆脱的局限。这种局限就在于：口语被限制在每一个单一的特定语境中，它们不具备普遍的可理解性。一种语境中产生的意义难以被其他语境中的人们所分享，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口语是一种“特殊的”话语。

与之相反，书面文化则在最大程度上摆脱了特殊语境的约束和局限。

当日常交谈发生的时候，说者与听者直接交流，交谈者们拥有共同的、活生生的语境。相反，在书面文化中，写作与阅读则是两种截然分离的活动。写作进行的时候，“读者”是不在场的；在阅读一部文本的过程中，“作者”则是一个缺席的存在者，他隐遁在文本的字里行间。写作与阅读分别处在不同的、彼此难以直接沟通的特定情境之中。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时的特定情境——例如是夜晚抑或白昼，在私人书房还是在公共图书馆，只要这些情境不被诉诸文字，成为文本内容的一部分，那么，它们对于“文本”意义的构成来说，就都是偶然的和外在的因素。口语式的当下语境，对于写作和阅读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正如保罗·利科指出的：“无论从心理的还是社会的观点看，文本都必须使自身‘脱离语境’（decontextualise），只有这样，它才能在新的情境中‘重获语境’（re-contextualise）——即，由阅读行为予以完成。”^[6]

文本摆脱了当下情境，因此，它便不再拥有直接的被指涉物。对于文本来说，被指涉物永不在场，它是“遥远的”存在物，或者已经消逝，或者尚未到场。与口头语言相比，文本的含义与被指涉物之间永远保持着一种间接的、距离化的、想象性的关系。

文本的意义独立于单一的特定语境，因此，它便能够适应更大范围的、各种不同的语境，能够为更大范围的、